

从海洋到城市：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的 共生逻辑与战略选择

郭彦汝¹

(1.广州航海学院 航运学院, 广东 广州 510725)

摘要: 本文以广州为研究对象, 批判性地审视了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 构建了一个整合批判理论与共生视角的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 旨在揭示二者共生的内在逻辑及其复杂性, 并探寻其优化路径。研究发现两者在广州历史中长期共生演进, 但当前经济融合、社会互动、空间衔接与生态关联中存在开发与保护、传统与现代等多重矛盾。为解析其内在逻辑, 研究构建了“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 指出了多元权力博弈、空间生产机制及话语竞争对共生形态的关键影响。基于此分析, 研究提出构建深度融合、包容韧性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目标, 并从优化权力、重塑空间、引导话语三方面给出路径建议与保障措施。研究通过运用整合性分析框架, 丰富了文化共生理论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应用, 为广州及其他海洋城市的文化发展与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海洋文化; 城市文化; 共生逻辑; 权力-空间-话语;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广州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96

一、引言

进入“海洋世纪”, 海洋的战略意义已远超传统的资源库角色, 成为牵动全球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1-2]。作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组成元素, 海洋文化的理论意义不仅体现在文化层面, 更对现代海洋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索具有实际指导作用。2012年我国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规划后, 通过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改革等行动, 持续推动国际海洋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3-4]。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身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 广州不仅是国家中心城市, 更在全球海洋城市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独特的区位与海洋历史传统更巩固了该市在国际海洋城市竞合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但在快速城市化与海洋产业扩张背景下, 广州海洋城市建设也面临三重结构性矛盾: 其一, 海洋生态保护要求与资源开发诉求之间形成持续张力; 其二, 传统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转化的价值博弈; 其三, 在制度性协同海洋产业升级与城市整体规划方面仍具提升空间^[5-7]。对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互动机制的系统解析, 能够填补现有理论研究的局部空白, 更对解决当前发展困境找到新的钥匙。

海洋文化研究领域, 国外学者起步较早, Braudel 以“长时段”理论揭示海洋环境对文明的塑造力; Lefebvre 与 Harvey 等则聚焦城市空间生产与文化符号。国内学者亦在海洋经济、文化认同、区域规划等方面取得进展。^[8-13] 回顾相关研究可以发现, 以往的探讨往往将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分离开来^[14-15], 较少采用整合性的共生视角来审视二者的互动关系, 理论层面的协同不足。基于对该局限性的认识, 本研究尝试另辟蹊径, 从批判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共生理论进行洞察, 提出“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笔者计划运用这一框架, 对广州的具体实践进行深入解读, 揭示其共生逻辑、权力运作和社会建构机制, 从而在研究视角、理论及方法论上提供新的思考。

二、理论框架：超越二元对立的共生逻辑

2.1 批判理论视角下的文化观

传统研究常视文化为一种静态同质的独立实体, 看重其传承与稳定, 容易忽视动态演变的过程并遮蔽其内在异质性^[16]。本文理论建构中关注两个关键点。其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 Theodor W. Adorno 和 Max Horkheimer 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 现代文化工业借由标准化生产, 隐性地控制大众意识, 使文化产品变成维护现存秩序的工具^[17], 这揭示不同文化形态往往映射出不同的权力关系、利益诉求及意识形态色彩, 故审视权力具体运作不可忽视。其二, 吸纳文化研究学派关于文化建构性的观点。Stuart 的编码/解码理论认为, 文化意义并

作者简介: 郭彦汝 (2004-)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海事管理和绿色航运。

非固定，它在生产、传播与消费中被持续建构和协商^[18]，这一视角为分析不同群体如何差异化解读海洋文化符号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2.2 共生理论的引入与拓展

共生 (Symbiosis) 概念源于生物学，指不同生物体间的长期密切互动，已广泛应用于社会文化领域，以阐释现象间的相依与互动^[19-20]。本研究将此概念拓展，定义“文化共生体”为两种以上文化要素在特定时空下相互依存、作用、建构形成的有机整体。广州的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在碰撞与滋养中塑造出独特的城市气质与文化景观，使其呈现为动态的文化共生体。文化共生强调不同文化间的互动、调适与共同演进，视冲突与张力为催生新文化意义的契机，从而为理解多元文化社会的复杂平衡提供独特视角。

2.3 权力、空间与话语：整合性分析框架

以系统地剖析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共生的内在逻辑及其社会建构过程为导向，研究由前述批判理论与共生理论进一步拓展，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权力-空间-话语”三维分析框架。

借鉴批判理论对权力弥散性与生产性的解读，权力在此超越传统政府制度性权力，涵盖资本的市场权力、社会组织文化实践权力乃至市民日常生活的微观权力，构成理解文化共生形态、驱动力、利益格局及潜在社会不公的关键切入点。这种多维权力并非抽象存在，而是深刻嵌入并生产着空间；遵循 Lefebvre 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被视为社会力量塑造的、承载权力运作与资本积累的建构场域，而非中立的物理容器。广州独特的海洋与城市共生空间结构，其生产逻辑、形态与实践，正是权力关系如何塑造物质环境并进而影响资源分配和社会交往模式的核心体现。在此基础上，话语依循 Foucault 的观点被视为权力的实践^[21]：它通过定义现实、建构知识、规范行为，为特定的权力关系和空间秩序赋予“自然性”或“必要性”。围绕广州海洋与城市文化的官方、媒体、学术、商业及民间等多元话语，共同构成复杂的“话语场域”，持续塑造并影响着公众对二者关系的认知图式。

借助该三维度整合分析，有望更深入地辨识广州文化共生的内在矛盾与创新可能，为建设兼顾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治理参考，并推动理论认知向实践指导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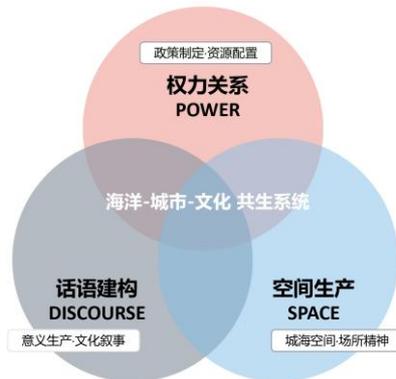


图1 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耦合图

三、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共生关系：历史与现实

3.1 历史维度：海洋文化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共生演进

秦汉时期，广州（番禺）凭借南海之滨的地理优势成为重要港口与南方重镇^[22]，至汉代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隋唐宋三代，海洋贸易持续繁荣，隋设南海神庙，唐立市舶司，形成“蕃坊”^[23]，见证了跨文化交流与区隔管理并存的格局，阿拉伯、波斯文化亦随之融入。宋代造船技术进步（如“南海一号”）与海洋贸易制度完善，

标志其海洋文化的成熟。明清延续海贸，乾隆朝“一口通商”政策使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十三行在此背景下兴盛^[24]，琶洲塔、莲花塔等兼具航标与文化象征功能。此阶段，海洋文化赋予城市开放务实的经济形态与文化特质。权力结构表现为中央集权主导，地方执行管理；空间格局以港口为核心延展，海洋相关建筑成为地标，“蕃坊”则体现了交融与区隔；话语层面，官方叙事（“天子南库”）与民间传说共同构建了认知体系（图2、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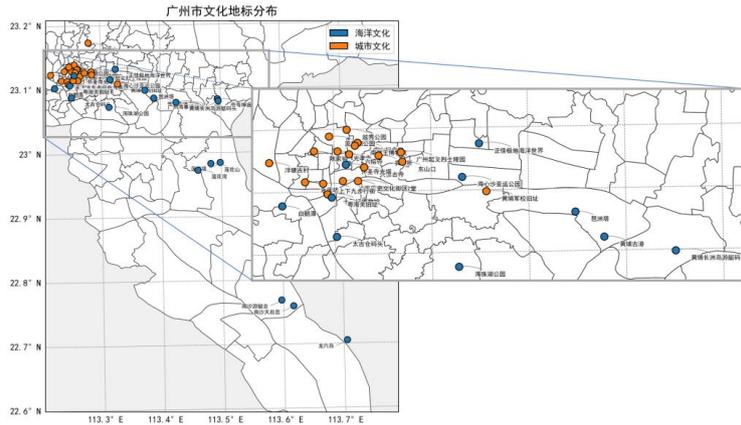


图2 广州市部分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地标分布示意图 (作者基于历史文献与现状调研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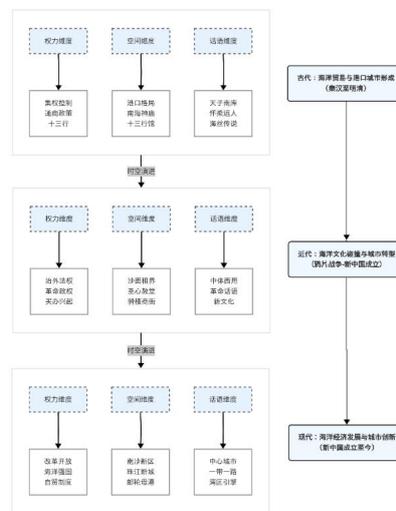


图3 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共生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权力-空间-话语维度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导致广州经济、主权与文化遭受剧烈冲击。沙面租界^[25]的建立是殖民权力与文化差异的空间烙印。外部冲击亦激发内部变革，孙中山在此领导革命，海洋文化中的开放进取精神与救亡图存主题结合，催生了独特的革命文化。此期权力格局复杂，西方势力、清政府、地方与买办、革命力量激烈博弈；城市空间因西式建筑与市政引入而呈现新旧冲突、中西杂糅的景观，粤海关大楼等成为时代标记，映射权力重构与文化博弈。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依托沿海开放优势，经济由外向型逐步升级为现代海洋经济，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开放、多元与包容^[26]。2021年，广州提出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南沙新区开发成为关键，承载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等多重功能，旨在拓展海洋发展空间，培育新兴海洋产业，并服务于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3.2 现实维度：共生关系的多元呈现与内在张力

纵览广州的发展格局，港口物流、海洋交通、滨海旅游及海洋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对广州经济贡献显著，广州港已成为国际主枢纽港（至2025年与世界百余国家400多港口通航），南沙自贸区亦注入发展动力。然传统临港工业转型、新兴产业可持续性、港城用地矛盾等挑战犹存。在社会层面，广州作为移民城市，大量海洋相关从业者带来了文化多样性，亦伴随社会融入挑战。以疍民为代表的传统海洋社群，其文化传承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空间挤压与生活方式转变的严峻考验，文化基因保护成为重要议题。从黄埔旧港到南沙滨海公园，海洋元素与城市结构交织。南沙新区拓展了发展空间，游艇、邮轮等提供了融合新平台。但部分沿海开发过度强调经济功能，忽视公共与文化价值，引发对滨海空间私有化和过度商业化的忧虑。城市生态与珠江口、南海近岸海洋生态系统休戚相关。陆源污染、港口航运及围填海工程持续威胁近岸海域生态。虽有“湾长制”等治理措施，但区域协调难、陆源污染控制复杂及发展与保护目标冲突等深层障碍仍待克服。

四、共生逻辑下的权力、空间与话语分析

4.1 权力关系的博弈与共生关系的塑造

政府作为核心规划者，通过“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下的政策制定、资源调配及议程设置^[27]，强力主导共生关系走向，彰显其将海洋发展置于城市战略核心的决心。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主导逻辑面临挑战：宏观政策与市场动态、社会需求的潜在错位可能引发资源配置与效率问题；政府内部不同部门间的职能分割与利益权衡亦可能削弱政策合力，限制其他主体参与空间。

商界作为活跃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并促进海洋活动与文化融合。以广州港集团为例，其庞大的外贸航线网络不仅巩固了广州的国际物流枢纽地位，赋予港区与腹地显著议价能力，更通过对港口、地产、旅游项目的投资开发与运营创新，推动了航运业发展及邮轮、滨海休闲等特色海洋文化的传播。然而，市场固有的逐利性亦构成潜在风险，在缺乏有效制度约束与社会监督时，可能导致粗放发展及对项目社会经济效应的选择性开发^[29]。

市民作为文化共生的创造者、消费者与传承者，其对海洋的认知、态度与行为直接影响共生关系的质量。尽管广州市民因地缘因素对海洋怀有天然亲近感，海洋文化已渗透日常生活，但城市化与现代生活方式正冲击传统海洋习俗与价值观。同时，市民在城市发展与海洋治理决策中的话语权与实际影响力不足，参与渠道受限，其权利保障、文化自觉与参与热情的激发，是海洋文化名城建设的关键议题。此外，行业协会、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NGO）等社会组织在监督与建言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但在促进文化传承、推动政企履责方面的自主性、资源与影响力仍有待提升。

综上，广州当前的海洋-城市文化共生图景，是在特定制度框架下，政府、企业、市民及社会组织等多力量基于各自利益、观念与资源，在持续互动、角力与妥协中共同形塑的。这种多元行动策略与权力博弈造就了复杂且充满张力的共生格局。欲达致更健康的共生未来，关键在于对现有权力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与结构性重构，迈向更平等透明、鼓励协商对话的治理模式。

4.2 空间生产的逻辑与共生关系的空间表达

空间并非仅为物质容器，依循列斐伏尔（Lefebvre）理论，空间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亦是权力与意识形态运作的关键场域。广州海洋与城市空间的独特结构与形态，既是共生关系及其矛盾的物质载体，也反作用于二者互动、社会分层及文化认同。

古代广州，城市围绕港口兴建，国家主导的海洋贸易繁荣推动了城市扩张与功能分化（如商馆区、蕃坊），此空间生产逻辑凸显了海洋贸易的主导地位及中央王朝通过控制关键节点与渠道以规制贸易及财富的意图。而当代广州，尤其是南沙新区的规划建设，代表了国家战略与全球资本共同驱动的空间生产逻辑。南沙的多重定位及其对“现代”“高效”“生态”“海洋”元素的强调，指向快速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滨海新城。此逻辑反映了广州在全球化与海洋强国战略下拓展海洋发展空间、培育高附加值海洋新兴产业的意图，并彰显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在空间生产中的主导作用及资本的深度介入。这种服务于国家战略的空间重构，在提升区域竞争力与城市形象方面取得成效，可视作一种空间治理创新。然而，南沙模式内含系统性挑战：大规模围填海对河口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压力；过度强调功能分区与高端产业，可能牺牲滨海空间的公共性与人文底蕴，潜藏功能单一化与“千城一面”风险；高速建设模式亦可能冲击本土文化传承与社区认同。因此，未来空间实践需超越对速度与规模的单一追求，转向将生态韧性、文化赓续与社会公平置于核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促进海洋与城市空间的和谐共生。

4.3 话语建构的力量与共生关系的意义生产

福柯（Foucault）的理论揭示，话语不仅是表征工具，更是权力实践^[30]，通过定义现实、塑造认知、规训行为，进而影响权力结构与空间秩序。围绕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形成的各类话语构成竞争性“场域”，共同型塑公众认知情感及共生关系的意义与价值。

官方话语通过规划蓝图、政策发布、政府报告及主流媒体宣传（如强调“海洋强市”、“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广州市建设海洋创新发展之都规划》中“文化亲海”定位），主导着方向塑造与公众认知。其核心策略在于将筛选并特定阐释的海洋文化元素与积极城市形象捆绑，服务于提升城市能级、吸引发展要素、强化全球海洋城市网络地位。但此类宏大叙事倾向于统一和正面化，可能简化历史复杂性或回避现实矛盾（如环境污染、文化冲突）。其效力深层取决于能否回应市民日常生活体验与文化认同。

主流媒体（如《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通常与官方话语保持一致，系统性呈现广州海洋历史成就、经济活力与文化特色，聚焦南沙港建设、海洋科技等积极主题，强化“海洋经济引领者”形象。然而，商业媒体与网络自媒体可提供更多元甚至冲突的观点（如滨海旅游消费、环境问题、开发项目社会影响）。所有媒体实体均受议程设置、商业利益或信源依赖等因素制约，可能导致报道偏差或简化。提升公众媒介素养与推动媒体生态多元化是关键。

学术界运用多学科方法（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对广州海洋与城市文化进行考察，如通过历史考古学重构“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叙事^[31-36]，并关注海洋保护、渔业社区变迁、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实挑战。知识从研究向公众传播存在障碍：转化渠道不足、项目资助的潜在影响、跨学科对话不足。未来需深化跨学科合作，拓展社会议题关怀，并探索有效知识转化与公共传播途径，以提升民众海洋文化素养与批判性思维。

市民通过口述故事、地方习俗、在线讨论与社交媒体分享等渠道，表达对海洋与城市的个人看法、生活经验与城市记忆。此类话语常呈现分散、多元、具体特征，真实反映市民生活经历、情感联系与文化认同，是对官方和媒体话语的重要补充，甚至形成修正或挑战。关注与理解基层声音对制定贴近民生、更具包容性的文化政策至关重要。

综上，广州海洋与城市文化共生关系的复杂现状，是多元话语持续互动、竞争、协商乃至相互建构的动态产物。不同主体基于各自立场、认知与利益诉求所发出的声音，共同交织成丰富且具张力的话语生态系统。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广州迈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目标，应着力培育更加多元、开放、包容的话语环境，鼓励理性对话与相互理解，使沟通成为凝聚共识、化解分歧、共同塑造城市未来的有效途径。

五、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共生的战略选择

5.1 战略目标：构建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包容韧性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依据《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广州致力于构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及海洋科技创新核心区。此定位要求广州兼具国际水准的经济、科技、基建等“硬实力”与引领性的海洋文化、治理、合作等“软实力”。功能层面，广州应成为多重中心：全球海洋经济枢纽（贸易、航运、金融）、全球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全球海洋文化交流中心^[7]，并探索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示范中心，贡献“广州方案”。

战略目标应超越规模速度，侧重质量与内涵，故提出“构建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包容韧性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此定位植根历史现实，面向未来。“深度融合”指价值观念、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等层面的有机结合、互促共进；“包容韧性”则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维护社会公平，并提升城市适应与恢复能力。其核心特质在于：将重塑的海洋文化精神（开放、包容、创新、进取）融入城市精神；实现海陆经济深度整合与绿色转型，培育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优化城海空间功能与生态联系，保护活化海洋文化遗存，建设高品质共享公共空间；将海洋文化元素融入日常生活，提升市民海洋意识、环境素养与文化参与，营造亲海爱海护海社会风尚。

5.2 战略路径：优化权力关系、重塑空间生产、引导话语建构

(1) 优化权力关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海洋治理新格局：针对权力主体失衡与治理模式局限，需从单一中心、自上而下转向权责利明晰、注重协商对话的共治共享格局。政府核心作用在于把握战略方向与设定规则底线（如生态红线），营造公平透明制度环境，从“全能管制”向“服务监管”转变，促进市场与社会力量协同。建立高效跨部门、跨区域协调机制。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强化其环境与社会监管，追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统一。实质性提升市民在涉海事中的有效参与和话语权，拓宽制度化参与渠道，增强文化认同与主人翁精神。积极扶持专业性社会组织，形成政、企、民、社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治理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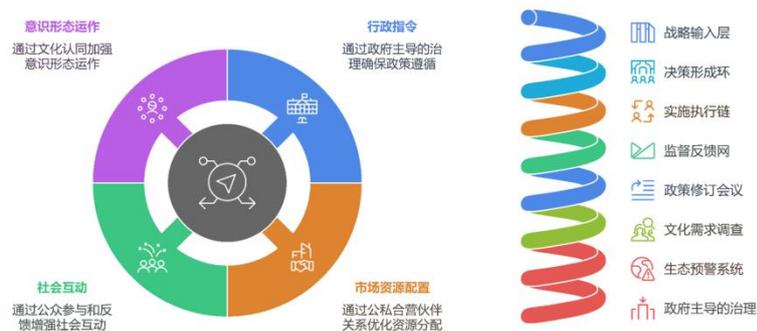


图 4 广州海洋文化政策路径示意图

(2) 重塑空间生产，营造生态人文、城海交融的可持续空间：为回应空间生产中生态破坏、功能单一、文化割裂等弊端，秉持生态优先、以人为本、尊重历史、和谐包容理念，推动城海空间有机融合与永续发展。坚持陆海统筹，将海岸带及近海纳入城乡统一规划，严守生态红线，优化空间布局，促进港、产、居、生态功能协调与陆海联动。严控滨海开发强度与围填海，优先保护修复自然岸线及生态系统，打造高品质公共性滨海开放空间。空间设计融入地方海洋文化，保护活化海洋文化遗产，塑造富场所精神与地方特色的城市景观。结合“灰”“绿”基础设施，提升海岸带生态韧性与防灾力。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智慧海洋建设，强化环境监测、资源管理与风险预警，提升空间管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

(3) 引导话语建构，促进多元认知与国际文化交流：面对民间声音易被边缘化、国际传播力待提升现状，广州需采取更开放、包容的话语策略，深化海洋文化认知，增进社会共识，扩大国际影响力。应夯实海洋文化学

术研究,鼓励跨学科、面向实践研究并促进成果转化,打造国际学术品牌。推动媒体报道客观、深入、多元,鼓励对敏感议题理性讨论。创新传播策略,平衡官方叙事与民间故事,提升城市海洋文化吸引力。积极参与和组织高水平国际海洋文化交流,在合作互鉴中提升全球话语地位。借助各级公共机构普及海洋文化教育,培育公民素养。培养具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及批判思维的专业人才队伍。

5.3 战略保障: 制度创新、政策支持、社会参与

(1) 制度层面: 深化改革创新, 破除体制壁垒: 核心目标是健全促进良性共生的长效机制。探索权责对等、运转顺畅的陆海统筹规划管理及生态补偿模式, 突破陆海与部门分割。修订并严施海洋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法规, 压实主体责任, 畅通公众监督, 提升保护利用实效。构建鼓励海洋文化特色创新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 为企业创新松绑助力, 开拓常态化、能影响决策的公众参与新路径。

(2) 政策层面: 精准有效赋能, 确保措施落地: 制定推行目标明确、成效显著的政策举措。设海洋文化发展专项基金, 明确投向与绩效评估, 重点扶持基础研究、多元传播、社区实践、可持续产业等。优化面向海洋文化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融资支持组合拳。健全覆盖研究、创作、保护、传播等环节的人才引进、培养、激励全链条机制, 给予政策倾斜^[38]。

(3) 社会层面: 广泛动员参与, 构筑共建共享格局: 核心是塑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海洋文明建设良好生态。具体行动: 创新文化传播触达方式(如海洋科普课堂、生态体验营), 使海洋意识培育融入日常生活, 提升公众保护自觉; 壮大海洋文化传承力量, 鼓励组建多元背景志愿团体, 开展遗址守护、生态修复等活动, 促进“市民-高校-科研机构”联动; 建设跨界融合有效载体, 利用南沙邮轮母港等地标举办创意活动, 设专业论坛深化产学研合作, 通过数字博物馆等促资源共享, 编织多方联动文化创新网络。

六、结论

本研究以广州为样本, 运用整合批判理论与共生视角的“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 系统揭示了其城市发展史中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深度交织、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节点至近现代转型, 海洋元素深刻影响了广州的城市空间、经济模式与社会构成, 孕育了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特质, 此构成其独特文化基因与发展动力。当前, 二者共生关系呈现高度复杂且充满内在张力的图景, 既是魅力与优势之源, 亦构成其应对发展与保护、效率与公平、可持续性等多重困境的严峻考验。

面对此现实挑战, 广州未来战略应锚定于构建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展现高度包容性与发展韧性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迈向此愿景, 需实施系统性变革, 协同作用于权力运作、空间实践和话语环境: 权力层面, 核心是推动治理模式向平等透明、协商对话的共建共治共享结构转型, 以制度创新保障多元主体有效参与, 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及责任担当; 空间层面, 须以生态优先、人文关怀为根本原则, 推行陆海统筹规划, 精心保护并活化海洋文化遗产及场所, 营造高品质生态人文共享滨海空间, 并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的精明化与可持续性; 话语层面, 应着力培育开放多元、鼓励理性对话的公共领域, 支持批判性、跨学科研究与创新性文化传播, 拓展国际文化交流, 培养具反思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这些战略路径的有效推进, 最终离不开强有力的制度创新、精准的政策扶持以及广泛深入的社会参与, 三者协同方能确保变革行稳致远。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 在于尝试引入此整合性“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 为理解城市场域中文化共生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 提供了有别于传统二元论或单一融合论的新解释视角。展望未来, 广州若要实现全球城市网络中的战略抱负, 应持续深化全社会海洋意识教育, 积极拓展多层次国际海洋合作, 以负责任态度拥抱并引领海洋科技进步, 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置于优先战略地位, 并始终以开放包容、勇于创新的文化姿态传承其海洋文化底蕴, 努力建设成为具独特魅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谱写新的辉煌篇章^[39]。

参考文献:

- [1] 徐萍. 新时代中国海洋维权理念与实践[J]. 国际问题研究, 2020 (6): 23.
- [2] 王莹, 王方方, 宋丹凤.“海洋强国”战略下港口新兴产业发展的财务风险管理及预警研究[J]. 中国市场, 2022,(20): 146-148.
- [3] 陈伟光, 孙慧卿. 全球海洋治理的国家参与: 一个比较分析框架[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4): 37-47.
- [4] Sheng E L. China at the Geopolitical Crossroads: The Construction of Sea Power[M]//From Colonial Seaports to Modern Coastal Cities: The Bohai Economic Rim and China's Rise as a Maritime Power.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4: 29-58.
- [5] 陈彦鸿, 潘蕾, 何婷婷, 等. 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南沙模式[J]. 环境, 2019, 11: 56-57.
- [6] Guilan L, Weiwei D. Synergetic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maritim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arine development in China[J]. Marine Policy, 2021, 125: 104383.
- [7] 廖健聪.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J]. 商业经济, 2020 (05): 35-37+90.
- [8] 韩兴勇, 杜贤琛. 浅议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协同发展[J]. 中国农学通报, 2014, 30(29): 75-80.
- [9] 尤晓敏, 瞿群臻. 海洋强国背景下的海洋文化认同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3, 41(21): 9176-9178.
- [10] Lefebvre H. From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heatre and performance design. Routledge, 2012: 81-84.
- [11] 大卫·哈维. 正义与城市[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2022: 1-403.
- [12] 刘泓, 叶凤琴. 对城市文化及其产业的一种思考[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05): 155-159.

- [13] Liu T K, Tuminez A S.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Urban Planning in Singapore[M]//50 Years of Social Issues in Singapore. 2015: 97-115.
- [14] Amendolagine V, von Jacobi N.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among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Comparing five Brazilian cultural ecosystems[J]. *Economic Systems*, 2023, 47(3): 101092.
- [15] 黄小芮, 孟鸣. 海洋文化地域特色在滨海城市风貌建设中的应用——以青岛滨海广场为例[J]. *设计*, 2020, 33(02): 143-145.
- [16] Tylor E B.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M]. J. Murray, 1871.
- [17] Horkheimer M.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J]. 1981.
- [18] Hall S.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M]//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 Routledge, 2007: 402-414.
- [19] 石献记, 朱德全.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文化共生场域[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1 (3): 43-52.
- [20] 江凌, 强陆婷. 上海实体书店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的共生发展[J]. *出版发行研究*, 2021, 3: 69-76.
- [21] Foucault M.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routledge, 2013.
- [22]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广州市志 (第一卷) [M]. 广州: 广州出版社, 1999: 35.
- [23] 王宏斌. 从蕃坊到租界: 试探中国近代外侨政策之历史渊源[J]. *史学月刊*, 2017(05): 75-84.
- [24] 汤开建, 田一言. 西班牙文手稿阿戈特《广州商馆日记》所反映的清代中期中西贸易和广州十三行史料[J]. *清史研究*, 2024(03): 1-21.
- [25] 李倩菁, 蔡晓梅. 广州沙面空间的生产与重构[J]. *热带地理*, 2015, 35(06): 814-821.
- [26] 张敏敏. 海丝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J]. *中国港口*, 2021(08): 55-57.
- [27]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R].
- [28] 蔡敏婕. 广州港集团已开辟 173 条外贸航线 [EB/OL]. 中国新闻网, 2025-02-08[2025-02-28].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5-02-08/doc-ineiumza6417875.shtml>
- [29] Bo Y A N, Jun D U, Ruimin F. Mechanism and path of deepening the marin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ase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construction[J]. *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7, 9(5): 10-20.
- [30] 韩清怡. 福柯话语权力视域下主流媒体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以央视新闻为例[J]. *科技传播*, 2021(1):62-64.
- [31] 梁凤莲. 历史·现实·理论: 广州城市历史文化的呈现及其展望[J]. *粤海风*, 2023, (04): 100-105+114.
- [32] 齐含伟, 贾梦蛟. 广州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大城市文化设施专项规划方法研究[J]. *北京规划建设*, 2022, (04): 121-123.
- [33] 赵谢璧圆. 海洋文化遗产视角下广州珠江口三塔历史环境保护与再生策略研究[D]. 华南理工大学, 2023.
- [34] 钟悠云, 黄小彪. 广州市实施海洋文化战略, 打造世界文化名城[J]. *珠江水运*, 2012, (05): 30-31.
- [35] 杨素梅. 广州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思考[J]. *当代经济*, 2012, (05): 80-81.
- [36] 柳姣羽. 分析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以广州对外贸易机构为例[J]. *旅游纵览(下半月)*, 2015, (20): 154.
- [37] Zeng S. The Marine Property Rights Operating Platform Buil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s Constructed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of Coastal Areas: An Example of Guangzhou City[J].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020, 112(SI): 216-219.
- [38] 唐刚.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及实现[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8(3): 256-263.
- [3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20.

From ocean to city: the symbiotic logic and strategic pathways of maritime and urban cultures in Guangzhou

GUO Yanru¹

¹ School of Shipping and Maritime Studies, Guangzhou Maritime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Guangzhou-focused study critiques marine/urban culture dualism, proposing a 'Power-Space-Discourse' framework. Integrating critical theory and symbiosis, it reveals their symbiotic logic and complexity, seeking optimization. Findings show historical symbiosis but current multifaceted contradictions in Guangzhou's socio-economic, spatial, and ecological spheres. Analysis highlights how power dynamics, spatial production, and discourse shape this symbiosis.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optimizing power, reshaping space, guiding discourse—towards an integrated, inclusive, resilient global maritime city. It advances cultural symbiosis theory in urban studies, offering insights for Guangzhou and other maritime cities.

Keywords: maritime culture; urban culture; symbiotic logic; power-space-discourse; global maritime center city; Guangzhou